

●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鲁 力

(华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作者简介] 鲁 力(1969-), 男, 湖北公安人,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摘 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 在晋武帝死前, 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 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 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 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 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 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关键词] 西晋; 八王之乱; 权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 K2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4-0462-07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它的爆发原因, 史学界已有很多探讨。景有泉、李春祥二位先生经过收集、整理, 归纳出13种说法, 如“宗王出镇说”、“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说”、“朋党纷争说”等等^①, 可以说是“题无剩义”了。但论者虽多, 却至今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统一结论(也许不必作如此追求)。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及研究成果的过程中, 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重新思考, 力求给自己一个圆满的解释, 现将个人之见叙述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八王之乱”的经过大致如下: 太熙元年(290年), 晋武帝病死, 弱智太子司马衷即位, 是为惠帝, 武帝皇后杨氏之父杨骏掌握政权。元康元年(291年), 惠帝皇后贾氏联合宗王铲除杨氏, 随后设计害死汝南王亮、楚王玮, 独操权柄。永康元年(300年), 贾氏被杀, 此后进入单纯的宗王相争阶段, 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先后上台并被杀, 东海王越最后取得胜利。光熙元年(306年), 惠帝死去, 怀帝即位, 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通观事件的大致经过, 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先后上台的序列? 为什么晋武帝死后由杨氏上台, 杨氏之后又是贾氏, 贾氏之后又是……? 难道这种序列的出现纯属偶然?

杨氏为武帝皇后, 贾氏为惠帝皇后, 两家都属于外戚。有论者将以这两人作为中心形成的势力集团分别称为“后党”和“太子妃党”^[1](第25页)。其余八王为宗王, 其中汝南王亮、楚王玮的出现是杨、贾两家外戚相争的附产品, 昙花一现, 与以后的宗王相争相隔10年, 不必细论。剩下的六王以惠帝为中心, 血缘及地位各不相同: 赵王伦为叔祖, 齐王冏为从弟, 可归于“尊亲”一类; 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为亲弟, 可归于“至亲”一类; 河间王颙、东海王越为从叔(已相隔4代), 可归于“疏亲”一类^②。

通过确定每个人的身分和地位,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八王之乱”中先后上台的势力依次为外戚和宗王, 具体而言则为: 后党(杨氏)→太子妃党(贾氏)→尊亲(赵王伦、齐王冏)→至亲(长沙王乂、成都王

颖)→疏亲(河间王颙、东海王越)。

这个序列如此明晰,以致我们很难说它的出现纯属偶然。换言之,“八王之乱”的发生及诸种势力先后上台应该有某种先天的原因。那么,这个“先天的原因”是什么?下面试对诸种势力形成、上台及下台的原因逐个分析,以求获得解答。

二、后党、太子妃党上台及下台原因分析

(一)后党

后党是以武帝皇后杨氏为依托而形成的势力,主要成员有后父杨骏,以及杨骏之弟杨珧、杨济等。太熙元年(290年),武帝病死,杨骏首先上台辅政。在“八王之乱”上台的诸种势力中,杨氏是上台最早的,但其得势却是最晚的。史称“帝自太康以后,……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1](卷40,杨骏传)。从太康元年(280)平吴算起,杨氏得势的时间不过10年(得势原因见下文分析),与其它势力相比,其根基要浅得多,那么杨氏为何能在武帝死后最早上台呢?

武帝临死前,朝廷中地位最重要的除侍中杨骏外,还有武帝的亲叔录尚书事汝南王亮。参照《晋书》卷3《武帝纪》及卷40《杨骏传》,太康十年(289年),武帝病危,出于杨骏的建议,汝南王亮被任命为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但他暂时没有离开洛阳。其后武帝疾笃,杨骏安插心腹,武帝察觉后,诏中书留汝南王亮与之共辅朝政,但杨骏从中书借诏不还,使武帝的任命落空。武帝弥留之际,已经不能说话,杨骏于是利用侍中的身分,召来中书监,口宣帝旨,使作遗诏,自为录尚书事,汝南王亮则出镇许昌。

杨骏这些举动的含义何在?众所周知,侍中为内,备顾问,参与决策;录尚书事为外,掌执行,为政务首脑。侍中虽然重要,但必须以皇帝为依托才能充分发挥决策作用,否则可以说是一个虚职。杨骏之所以有权势,主要是因为武帝宠信他,他可以影响武帝的决策,从而指挥外朝的运转,侍中一职只是为杨骏提供了接近武帝的便利及参与决策的合法身分。武帝死后,即位的太子司马衷是弱智,毫无决策能力,杨骏的权威也会随之大大降低。因此,杨骏如果想在武帝死后继续专权,不能单纯依靠皇帝及侍中这个职位,最好能够亲掌朝政——收回汝南王亮的录尚书事,将决策权与执行权统一起来。

杨骏最后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自然是他个人贪权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武帝宠任外戚的结果。平吴以后,杨骏一直处于权力的核心,一旦武帝病危,只有他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独掌朝政。我们看到,武帝在临死前意识到外戚专权的危险,曾想用宗王来平衡外戚,但为时已晚,即使诏令已经发出,杨骏也能收回并重改。

(二)太子妃党

太子妃党是以太子妃贾氏为依托而形成的势力,主要成员有贾充、荀勖、冯紞等,这些人在武帝生前已经死去。惠帝即位后,太子妃贾氏升为皇后,皇后杨氏升为皇太后,杨氏之父杨骏继续当权。元康元年(291年),贾后以惠帝名义发出诏令,将杨骏及其党羽全部铲除,又设计害死汝南王亮与楚王玮,自己独操权柄。如果当初不被立为太子妃,贾氏就不可能成为目前的皇后,更不可能掌握朝政。那么,贾氏是如何成为太子妃的呢?

我们知道,贾后之父贾充是西晋开国功臣集团(或说近臣集团)的重要成员。西晋初期即有民谣说:“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2](卷40,贾充传)这三个人即贾充、裴秀、王沈,是亡魏成晋的主要人物,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就是由贾充下令杀死的。但是,在西晋政权建立后,武帝的态度却有了变化,他转而对任恺等“忠正”之士“器而昵之”,准备遣贾充出镇关中^[2](卷45,任恺传)。近臣们当然不愿就此失势,但又不能直接违抗武帝的诏命,于是想出了一个联姻的计策:要求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如此,则贾充就能以联姻为借口,继续留在中央了。这个看似一厢情愿的要求为武帝所接受,泰始八年(272年),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

为什么武帝的态度一转再转,最后又回到近臣集团这边,并与贾氏联姻呢?对此,唐人李德裕论道,

“晋氏倾夺魏国,初有天下,其将相大臣,非魏之旧臣,即其子孙。所寄心腹,唯贾充而已。充亦非忠于君者,自以成济(杀曹髦者)之事,与晋室当同休戚。”^[3](卷1,羊祜留贾充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未必是武帝对贾充先赶后留的真实的、具体的、直接的原因。个人以为,理解西晋前期政局,齐王攸是一个关键人物,许多事情都与他有关,武帝对贾充态度的变化也是如此。齐王攸是武帝的同母弟,“才望出武帝之右”,司马昭曾想立其为嗣,只是由于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而未果,胡三省认为此事“为晋武帝不能容齐王攸张本”^[4](卷78,咸熙元年条胡注)。代魏以后,齐王攸又“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2](卷38,齐王攸传),是皇位的潜在威胁。而贾充的一个女儿正好嫁给了齐王攸,自然成为武帝猜忌的对象,任恺等人排斥贾充,原因之一也是“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3](卷45,任恺传),因此,武帝在即位之初就想赶走贾充。至于以后复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一方面是贾充的同党多方游说的结果^[2](卷31,惠贾皇后传),另一方面应是武帝害怕贾党在失意中倒向齐王攸,故万般无奈之下,顺水推舟,借联姻以拉住贾党,尽管对“妒而少子,丑而短黑”的贾氏很不满。概言之,武帝与贾氏联姻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对付所谓的“魏之旧臣”及其子孙,而是来自家族内部的宗王。

这样,经过不少波折,近臣集团与武帝的关系就以血缘为纽带固定下来,近臣集团由此转化为外戚集团,即论者所说的“太子妃党”。

但如前所述,在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武帝又转而宠任后父杨骏。杨骏出于弘农华阴,其先祖“四世为三公”^[2](卷93,杨文宗传),属于汉代旧族,但他本人官爵不显,“素无美望”^[3](卷40,杨骏传)。那么,武帝为何重用杨骏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杨骏为皇后之父,较贾氏更为亲近,另一方面,则应是武帝受到贾党的制约,转而寻求新的党援的结果。这从两件事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一是废太子。太子是弱智,武帝一直将信将疑,后来才完全明白他无力继承大统,于是准备废黜太子,但由于太子妃党的一致反对而未果。二是伐吴。伐吴可能会危及太子妃党的既得利益,同样受到他们的阻挠,但武帝这次执意进行并取得了成功。由此可见,作为武帝股肱的太子妃党,却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武帝意见相左,不免使武帝感到碍手碍脚。而杨氏毫无朝望,可以对武帝言听计从,所以在平吴后得到武帝的宠任。随着后党势力的形成,太子妃党慢慢淡出,但他们留下的联姻成果却对以后的政局发生了深刻影响。

武帝死后,杨骏辅政,但不久被贾后铲除。贾后所以要上台,除了权欲之外,我们还可以为她找出许多不满杨氏而要赶走她的“理由”:贾氏于泰始八年(272年)入宫,而杨氏于咸宁二年(276年)入宫,贾氏的资历要老;贾氏大杨氏两岁,反而贾氏为媳,杨氏为婆;惠帝与杨氏同年,不是杨氏亲生,而是其堂姐所生;贾氏之父是权势熏人的贾充,而杨氏之父是毫无朝望的杨骏。但是,这些都不是“合法的理由”。我们知道,外戚当政的基础是姻缘关系,而姻缘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较血缘关系衰减得更快。武帝在世时,杨氏为亲,贾氏为疏;惠帝即位后,则杨氏为疏,贾氏为亲。换言之,惠帝这张虎皮的真正主人是贾后,而不是杨骏,所以,杨骏自己不愿意离开,还得请他离开。而贾氏所以有能力赶走杨骏,无非是离弱智皇帝——惠帝最近,有矫诏的便利;但仅有诏命还不行,还得有人愿意承命,这就是为杨骏所排斥的宗王;而贾后居于宫内,宗王居于宫外,还得有人牵线,这就是出入宫廷的宦者与禁卫。

自元康元年(291年)开始,贾后一共操了10年的权柄。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将太子司马遹害死,随即被宗王废黜并杀掉。外戚与皇帝的关系,正如狐狸与老虎的关系,狐狸所以吓人,是因为有老虎在后——外戚所以有势,是因为有皇帝撑腰。与杨骏一样,贾后能够专制天下,主要在于假威皇帝,称诏行事。由于惠帝是弱智,贾后之所假,其实还包括太子司马遹在类。但贾后权诈有余,识量不足,忘记了自己的狐狸本质。当太子年长,与贾后逐渐产生矛盾时,贾后竟将他囚禁并害死。在宗王林立的政治环境中,害死太子使贾后失去了当权的依托,无异于自杀。

三、尊亲、至亲、疏亲上台及下台原因分析

(一)尊亲

尊亲主要指司马懿之子,即武帝之亲叔,或惠帝之亲叔祖。贾氏被杀后,进入单纯的宗王相争阶段,首先上台的便是杀死贾后的赵王伦。赵王伦于惠帝为叔祖,二人相隔4世,血缘已疏,但因为是司马懿之子,所以,在宗室中地位很高,属于尊亲一类。为何宗王至此时才上台?此时在世的宗室成员不少,为何最先上台的是这一类成员?这与武帝时期的用人政策有没有关系?

众所周知,司马氏对家族成员的任用始于曹魏末年,直接的目的当然在于巩固权位,为代魏奠定政治基础。如果从社会背景上分析,则通常认为是为了对抗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5](第140页)。武帝即位后,宗室成员继续受到普遍的重用。但细绎史实,我们不难发现,武帝一直对宗王敬而远之,多让他们出镇地方,即使他们身在中央,也几乎没有让他们担当过心腹之任。究其原因,无非是宗王血缘太近,容易对皇位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武帝才将外戚视为可以信赖的力量,他先是重用太子妃党,后来又宠任姻缘更近的后族杨氏。武帝死后,也由处于权力核心的杨氏、贾氏先后执政,他们倒台后才轮到外围的宗王。

至于首先上台的是尊亲而非其他宗王,则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参《晋书》之《武帝纪》及诸《宗王传》,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立时,以武帝为中心,在世的宗室有叔祖1人、叔父6人、从伯从叔16人、亲弟4人,其余则为从弟从子。前面这些辈分较高或血缘较近的宗室成员共计27人,全被封王。而武帝自己的儿子,当时最大的司马衷(即以后的惠帝)才7岁,根本没有从政能力。咸宁三年(277年),有3位皇子被任命为禁军将领,但其中2位仅有6岁。因此,历武帝一朝,在中央居于高位的几乎都是年长的尊亲,如安平王孚、义阳王望、汝南王亮等,血缘很近的至亲只有武帝的同母弟齐王攸一人。武帝末年,为了巩固太子的皇位,又让几位年长的皇子出镇远方。杨骏当政时,对宗王一概排斥,结果被贾氏利用。贾氏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则采用分化的办法,对血缘较疏的尊亲予以重用,而对血缘很近的惠帝诸弟予以压制(详见下文)。当时,惠帝的亲叔父已全部死去,亲叔祖在世的还有3位,其中平原王榦有病,梁王彤平庸,只有赵王伦长期出镇,颇有实力,性又贪婪。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害死太子,梁、赵二王便不再顾忌,将贾氏废黜并杀掉,由赵王伦辅政。

宗王当政与外戚当政有本质的区别,外戚不过是假借虎威的狐狸,通常只能依仗皇帝而得势,要登上皇位是很困难的,而宗王只要有机会,就很容易夺取皇位。外戚在台上,还可以成为皇帝与宗王之间的缓冲,但贾后被废使缓冲不复存在。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便轻而易举地篡夺了皇位。他为惠帝的叔祖,依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是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来继承皇位的。而且,他在位时宠任僚属、大开封赏、滥杀大臣,朝政极其败坏,所以篡位不久便遭到出镇宗王的群起讨伐。

永宁元年(301年),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乂等起兵讨伦,伦被擒伏诛。齐王冏上台辅政。为首的是齐王冏而非他人,也不无缘由。起兵之前,居于中央的宗王都遭到赵王伦的压制,只有出镇的宗王有能力起兵。出镇宗王主要有3人:镇许昌的齐王冏、镇邺城的成都王颖、镇长安的河间王颙。其中,河间王颙为惠帝的从叔,已隔4代,血缘太疏,不为众人所服。成都王颖为惠帝的亲弟,势力也强,但他出镇已有两年,在朝中没有影响。齐王冏为惠帝的堂弟,其母又为贾后之姊,介于亲疏之间;其父齐王攸生前很有威望,他本人也一直任职中央,赵王伦曾与之共废贾后,在中央较有影响;而且,齐王冏是受到赵王伦的排挤才离开洛阳的,对赵王伦心存不满。所以,齐王冏顺其自然地充当了讨伐赵王伦的主角,并在赵王伦被杀后上台辅政。

(二)至亲

至亲为武帝诸子,即惠帝诸弟。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又起兵讨伐齐王冏,居于洛阳的长沙王乂(已从常山改封长沙)顺势杀冏,上台执政。二年(303年),颙、颖复起兵伐乂,乂被杀。

颖于邺城遥执朝政。长沙王义与成都王颖都是惠帝的亲弟,因为惠帝惟一的儿子司马遹已被贾后害死,从血缘上说,这类宗王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如前所述,武帝在世时,他们因为年龄较小,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作为。太康十年(289年),武帝患病,参《晋书》诸《纪》及《宗王传》,当时在世的皇子有10位:司马衷(31岁)、司马柬(28岁)、司马玮(18岁)、司马允(18岁)、司马演、司马遐(17岁)、司马义(13岁)、司马颖(11岁)、司马晏(9岁)、司马炽(6岁)。同年11月,改封皇子柬为秦王、都督关中,玮为楚王、都督荆州,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又立义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

可以看出,除太子以外,三位出镇的皇子恰恰是最年长的,而且出镇的地区都在镇抚吴蜀的边缘地区,其他皇子虽未出镇,但封国也多在吴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晋书》卷3《武帝纪》称武帝此举在于“镇守要害,以强帝室”,但同书卷46《刘颂传》所载刘颂上书云:“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宜得壮主以镇抚之。”可见,以年幼皇子镇抚吴蜀并非妥当之举,应该不是武帝的本来目的。个人以为,由于太子是弱智,如果让年长皇子在武帝死后继续留在中央,很容易对其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武帝要让他们出镇远方。至于其他几位皇子,据史书记载,演有病,遐懦弱,义、颖、晏、炽年幼,留在中央暂无大碍。但武帝也几乎将他们全部封在吴蜀地区(演封在北边),一旦他们长大或有变故,就可以让他们远远地离开洛阳。

杨骏上台后,对宗王一概排斥,结果被贾后利用,惠帝诸弟全被诏回^③。随后一段时间,惠帝诸弟全在洛阳,汝南王亮深感不安,建议遣诸王之国,楚王玮甚为愤恨,贾后遂利用二人的矛盾,将他们先后害死。在玮被杀3个月后,秦王柬莫名其妙地病死了。长沙王义因为与楚王玮同母,被贬为常山王,随即就国。淮南王允就国大约也在此时。其后,成都王颖渐渐年长,见贾后之侄贾谧与太子下棋相争,厉声呵道:“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贾谧甚惧,于是进言贾后,让颖出镇邺城^[2](卷59,成都王颖传)。赵王伦上台后,对惠帝诸弟尤为猜忌,因淮南王允有兵,便想夺去,允不胜其愤,称:“赵王欲破我家!”最后兵败身死^[3](卷64,淮南王允传)。

讨伐赵王伦时,惠帝诸弟中只有成都王颖任邺城都督,实力最强,常山王义则利用了国兵。赵王伦被杀后,齐王冏辅政。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重新挑起事端,推颖为首讨伐齐王冏,理由是冏“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4](卷4,惠帝纪)。这一点其实很难证实,冏所以遭到讨伐,血缘才是根本原因。武帝临终前让年长皇子远离中央,形成疏者近而亲者远的格局,这本是一种平衡的策略,但在他们的心中,想来是极不平衡的。当宗王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后,血缘便是相争的主要依据,亲者总是在向权力中心靠拢。冏居于尊、亲之间,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当初冏、颖会于洛阳时,新野王歆曾劝冏“夺其(颖)兵权”^[2](卷38,新野王歆传),长沙王义则对颖说“先帝之业,王宜维之”^[4](卷59,长沙王义传),便是二人相争的兆头。冏主政后,曹摅、王豹、孙惠、郑方都曾上书劝冏退让,冏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不久果然遭到讨伐。

齐王冏被杀后,长沙王义首先上台执政,至亲势力经过长久的压抑,终于升到权力的顶端。但长沙王义实力较弱,仅仅是因为身处洛阳才占得先利,成都王颖对此自然心存不满,于是又起兵伐义。此后,颖被立为皇太弟,于邺遥执朝政,终于如愿以偿。宗王相争的依据是血缘,成都王颖以至亲而辅政,势力也很强大,应该是无人相争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疏亲

疏亲为宣帝诸弟之后。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又起兵伐颖,但在荡阴遭到失败,惠帝被送至邺城,越则返回东海国。不久,颖为越弟新蔡王腾及王浚所破,奉惠帝迁至长安,河间王颙执政。二年(305年),越起兵伐颙,颙败,后被越弟南阳王模杀死。光熙元年(306年),惠帝返回洛阳,不久死去,怀帝即位,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都是惠帝之从叔,与惠帝已相隔4代,属于疏亲一类。这类宗王中有少数人因为辈分很高,如下邳王晃、高密王泰等,曾在中央居于高位。至于其他辈分较低者,如义阳王威、新野王歆、晋陵王楙等,在争夺中只能依附于不同的势力。辈分高者可以居于高位,但很难成为主宰,辈分低者

就更不必说。但在“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却不仅参与了争夺(河间王颙另论),而且逐渐居于主宰地位。那么,东海王越为什么要参与?又为什么能参与?这是因为: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已超越血缘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东海王越长期居于中央,最终成为中央势力的代表;成都王颖长期居于地方,最终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之争,表面上是疏亲与至亲之争,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争。

外戚在中央依附于皇权,所体现的是中央势力,而宗王历职内外,其僚属多出自地方,地方性很强。贾氏被废以后,宗王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僚属也随之攀升。赵王伦曾出镇关中,在他当权期间,其僚属孙秀等皆封大郡,“同谋者咸超阶越次”,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以至有“貂不足,狗尾续”之讥^[3](卷59,赵王伦传)。又吴人在晋朝仕进艰难,赵王伦却颇为照顾,陆机、郗鉴、贺循、顾荣、戴若思、刁协、应詹等皆为其所辟,见《晋书》各人本传。淮南王允都督扬、江长达10年,元康九年(299年)被召还时,所将之“淮南奇才剑客”也随同入朝^[2](卷64,淮南王允传)。齐王罔起兵于许昌,上台后也是宠任亲昵,以“五公”为心膂^[2](卷59,齐王罔传)。长沙王乂一直被贬在国,罔起兵时,乂率国兵应之,其后国兵便是他依靠的主要力量^[2](卷59,长沙王乂传)。成都王颖更是如此,罔失败后,他一直于邺城悬执朝政,被立为皇太弟后,又将乘舆服御迁于邺城,罢宿卫兵以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2](卷59,成都王颖传)。

任职中央的多是势族高门,而宗王的僚属具有浓厚的地方、寒庶色彩,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仇视。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海王越充当了维护中央权益的角色。参《晋书》卷37《高密王泰传》及卷59《东海王越传》,越出于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一系,这一系多任职中央,在宗室中甚有声望。越本人也“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官至司空、领中书监。这种家世及个人资历,便成为东海王越上台的重要凭借。

河间王颙得势的原因与越有异:越居于中央,得到朝臣支持;颙居于方镇,攀附于成都王颖。颙于元康九年(299年)出镇关中,“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3](卷59,河间王颙传)。宗王相争中,颙虽然居于西部重镇,但因为血缘太疏,不能成为争夺的主角,只能随势而动,见机行事:齐王罔起兵时,他不知所从,初附赵王伦,后闻罔、颖兵盛,又回应二人;罔上台后,颙见颖于惠帝为亲,有望登上宝座,自己可为宰相,于是推颖为首,先伐罔,后伐乂;颖失败后,奉惠帝迁至长安,颙才上台执政。可见,只是在宗王中有实力者死伤殆尽之后,河间王颙才有了成为主角的机会。

四、小 结

旧史在解释某一事件时,往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4](卷35,诸葛亮传),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八王之乱”。所谓“天时”,在这里指社会背景。我们知道,门阀势力的发展至迟可追溯到西汉末年至东汉后期,本地大姓子孙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已被视为通例^[7](第43页)。司马氏在代魏之前开始任用宗室成员出镇入辅,就社会背景而言,目的应在于对付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所谓“人谋”,在这里指晋武帝的一系列用人政策。宗王可以巩固皇权,但同时也可能对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武帝对他们敬而远之,对血缘很近的至亲尤为猜忌。为了对付宗王,武帝又从近臣集团中培植了外戚势力,先是重用太子妃党贾氏,后来又宠任更为亲近的后党杨氏。

这样,在晋武帝生前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党、太子妃党);宗王(尊亲、至亲、疏亲);门阀。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同时也由皇帝来操纵。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弱智,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后党、太子妃党、尊亲、至亲、疏亲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中间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势力的汇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八王之乱”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待这些人死伤略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注 释:

- ① 见《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 年第 5 期。福原启郎从国家私权化及士大夫舆论的角度对“八王之乱”作了考察,见《八王之乱的本质》,《东洋史研究》第 41 卷第 3 号,昭和 57 年。
- ② “至亲”、“疏亲”的概念都见于《晋书》。“尊亲”在《晋书》中指尊崇亲属,本文为表述方便,用作名词,主要指辈分及地位较高的司马懿之子。其中,齐王冏为惠帝之从弟,论辈分和血缘都不能称尊,但其父为武帝之同母弟齐王攸,其母为贾后之姊,这种身分是他得势的重要原因,故划入“尊亲”一类论述。
- ③ 秦王柬、楚王玮来朝事见《晋书》各人本传,淮南王允来朝事见卷 4《惠帝纪》及卷 46《刘颂传》。诛杨骏时,楚王玮屯司马门,下邳王晃领护军、屯东掖门,东安王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淮南王允的国相刘颂屯卫殿中,诛杨骏后,高密王泰领骏营,见《晋书》各人本传。

[参 考 文 献]

- [1] 杨德炳. 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J]. 武汉大学学报, 1995, (3).
- [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李德裕. 李卫公外集[A]. 四库全书[Z].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5] 唐长孺. 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A].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桂 莉)

An Outline of the “War of the Eight Princes”

LU L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nan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LU Li (1969-), male, Doctor,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n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different power groups that appear in the war of the eight princes, considers that a pyramid-shaped structure of power has been established before the death of Emperor Jinwu. Emperor is on the top of the pyramid; the followings are maternal relatives, imperial princes and great families. After the death of Emperor Jinwu, the different power groups ascend and descend one by one because the idiotic Emperor Hui can't control the structure, the great families come to power at last. This disturba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contradiction of emperor and great families.

Key words: West jin dynasty; war of the eight princes; power structure